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研究

——基于新疆北部三个社区的考察

罗 意 古力扎提

【摘 要】文章以三个社区民族志调查为基础，对新疆北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嵌入过程与形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提炼出了各民族“在交融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融”的嵌入机制。这套机制是各族群众生活历程与社区发展历程互构的自然结果，不同层面的嵌入构成了整合有序的结构功能体系，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展演和再生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间的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共生合作与相关制度保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条件。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关 键 词】交融发展嵌入机制；新疆北部；民族志调查

【作者简介】罗意，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古力扎提，女，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乌鲁木齐 830017）。

【原文出处】《民族研究》（京），2023.2.1～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疆牧区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化牧民生计策略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2BMZ009）、2023年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课题“新疆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ZJFLZ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9月，中央在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①]2021年8月，中央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原则，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②]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嵌入机制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化了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北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迪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云南“山坝结构”民族分布新变化，呼伦贝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等。[③]

新疆北部一些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和谐的事实十分引人注目。[④]该地区民族团结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广泛的现实基础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新时代，需要对该地区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后文简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形态、经验和推进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深度调研为基础，结合历史与现实，拟对新疆北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及其内涵、生成条件与发展前景进行探讨。2010年以来，笔者完成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红墩社区、塔城市哈尔墩社区和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吐尔洪盆地三个各民族相互嵌入典型社区的调查。[⑤]三个社区分别形成于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各自位于农业区、城镇与牧业区。本文将三个社区并置，以建立起近代以来新疆北部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时空连续体”，先从空间嵌入的角度描述三个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再对各民族在文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嵌入形态进行分析。

二、近代以来新疆北部各民族空间嵌入的形成与发展

新疆北部大体指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中央是介于两大山系之间的准噶尔盆地，西面是通往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河谷与山口，是欧亚草原的一部分。17世纪中期，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东西的厄鲁特蒙古中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统辖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叶尼塞河上游和伊犁河流域等广大地区。[6]18世纪中叶后，随着清平定准噶尔和沙俄在中亚的扩张，新疆北部的人口民族结构经历了持续的变动。在此，将本文研究的三个社区形成与发展历程置入近代以来新疆北部人口民族结构变化的脉络中加以描述和分析，进而反映该区域各民族空间嵌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18世纪中叶清平定准噶尔后，在东天山和天山北路地区实行了戍边、屯垦和移民的政策，建立起了东起巴里坤屯垦区、西至伊犁屯垦区绵延的农业带，以及以迪化和伊犁河谷为中心的乌鲁木齐城市带与伊犁九城城市带，深刻改变了新疆北部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民族迁移，包括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等族群西迁，内地汉族、回族与南疆维吾尔族迁入新疆北部，以及流散厄鲁特群众的安置与土尔扈特部东归等。新疆“南回北准”的人口民族分布格局得到改变，新疆北部人口民族结构也因此实现了多元化发展。吴轶群根据《伊江汇揽》《总统伊犁事宜》《新疆识略》等文献中伊犁人口数据粗略算出了乾隆、嘉庆朝该地区人口的民族结构比例。根据她的测算，以伊犁地区为例，乾隆四十五年(1780)共有6个民族的人口，其中满族(33.5%)、维吾尔族(25.4%)、察哈尔与厄鲁特蒙古(20.2%)、汉族(11.4%)、锡伯族(5.5%)与索伦营(4%)。[7]得益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内地商民持续迁入。到嘉庆朝时期，伊犁已成为移民聚集地。因此，当乾隆四十二年土尔扈特人口迁往塔尔巴哈台地区后，伊犁人口不降反增。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伊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9‰。[8]同期，沙俄向中亚扩张，境外哈萨克族持续迁入以寻找更优的游牧地。嘉庆十年《塔尔巴哈台事宜·户口》中有“投诚哈萨克一佐领，丁532，户94，大小口1059”的记录，[9]说明哈萨克族在19世纪初在新疆北部已经稳定下来。

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三年(1877)，新疆经历了13年战乱，导致18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北部农业开发、城镇体系和多民族分布格局发展进程中断。各族军民逃往西北方阿尔泰山草原避难，于1867年前后在布伦托海(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汇聚。甘肃洮州喇嘛棍噶扎勒参组织僧众、额敏河流域十苏木军民和汉民前往塔城援助清军，后又带领军民逃往布伦托海。[10]同治六年初，塔城参赞大臣李云麟奏请求在布伦托海设办事大臣，他追求政绩心切，强征男丁充当兵勇，又令妇孺老弱开荒种地，激起民变。棍噶扎勒参抓住时机招抚了民变百姓，在稳定时局中又做出了贡献。光绪皇帝为表彰其功绩，允许棍噶扎勒参借地阿勒泰修建千佛庙宇，即承化寺。[11]跟随的汉族群众就地转变为屯民，在阿尔泰山西南麓克兰河中游形成了红墩社区，而这些屯民被游牧民称之为“户儿家”。[12]承化寺很快成为阿尔泰山草原南麓的商业中心，吸引了天山北路经商的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商人。承化寺与克兰河谷便成为嵌入阿尔泰山草原深处的城镇与农业区，重塑了当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战后，清政府一方面组织安置了流散的军民，另一方面仍广兴屯垦，恢复重建了过去的农业带与城镇带。在清军收复新疆过程中，不少赶大营的货郎随军前行，又以天津杨柳青商人最为知名。收复新疆后，一部分货郎便长居新疆北部各城，以经商为业。[13]1864年后，随着中俄边界的确立，哈萨克族依据“人随地走”原则在新疆北部安定下来，逐渐在新疆北部各地人口中占有了相当地位。周东郊颇为感慨地指出“民族移动是最近二百年阿山最大的事件”。[14]为解决农业发展所需人口，新疆巡抚陶模提议“就地另行招垦”，即迁移缺少土地的贫苦维吾尔族人户到新疆北部及其他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荒落户。[15]19世纪中叶后，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得以在伊犁、塔城建设贸易圈和派驻领事，一些俄罗斯人和俄属中亚商人因此长期留居各城。以伊犁为例，《新疆图志·民政志》所载1902年人口数据中，绥定县与宁远县各有“外国人寄居”81户和1224户。[16]因此，清末新疆北部恢复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且有了新的发展。1910年初，中国地学会会员马登瀛、贾树模到访塔城，记录了塔城的民族情况，说“计人种有汉人、蒙古人、回民、缠头、奥歌义(中俄混血)、哈萨及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人”。[17]在塔城，南疆迁入的维吾尔族逐渐在城市东北郊“加吾尔塔木河”和“喀拉墩河”切割而成的台地形成了一个聚居点，这就是哈尔墩社区的前身。民国时期新疆北部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际性与区域性重大事件，[18]导致俄罗斯、乌孜别克、哈萨克、塔塔尔等族迁入长居，再次改变了当地民族分布格局。周东郊对这一时期塔城与阿勒泰两地民族结构的变动有清晰描述，“(塔城)欧战与俄国革命当时逃来的哈萨克人、俄罗斯人，总计约有数万，东北义勇军留此也不少”；[19]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道“民初外蒙侵阿尔泰，新土尔扈特部多半移入迪化区，乌梁海部的居民自此以后，又多为外蒙掳去，因之阿山区的蒙民日减，而哈民因生活条件优越，逐渐繁殖”。[20]民国三十二年(1943)新疆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塔城市与承化县生活着哈萨克、汉、维吾尔、回、塔塔尔、乌孜别克、锡伯、蒙古与满等九个民族，塔城市还有少量索伦族(达斡尔族)。[21]20世纪30年代吴蔼宸考察伊犁时记录下的民族有汉、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索伦、蒙古(包括察哈尔与厄鲁特)、归化(俄罗斯族)、满等族。[22]

一些游记中的记录显示，民国时期新疆北部各民族形成了“小聚居”格局。1917年初，谢晓钟到访承化，记录道“阿山种族复杂，汉、回、蒙、哈、缠民，相与聚处，各为礼俗，自成风气”。[23]民初，塔城仍旧分为了汉城与满城，两城之间则是俄商贸易圈。谢晓钟说“塔城人种庞杂，大类伊犁，汉、缠、回三族而外，又有所谓满(新满营，实为索伦、锡伯)、蒙、哈萨克者”。[24]

随着人口的增加，各民族“小聚居”的格局逐渐被突破。20世纪20-30年代，红墩新增了十五六户哈萨克族、十来户维吾尔族和一户回族。这些维吾尔族本是在承化寺周边的商人，发家后，到邻近的红墩购买田产，新建田庄。苏联推行激进集体化后，一部分哈萨克族家庭从斋桑湖沿着额尔齐斯河来到中国，后到红墩定居务农。一户回族则是20世纪20年代从甘肃前往阿尔泰山的淘金者，在红墩娶了哈萨克族妻子后定居。

塔城哈尔墩社区也由南疆维吾尔族移民的聚居点转变为了多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到20世纪40年代，社区中已有了6户俄罗斯族、3户汉族、2户哈萨克族和1户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与乌孜别克族居民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来到塔城安居的家庭，俄罗斯族是华侨家庭，汉族则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后裔。总之，民国时期新疆北部各民族“小聚居”格局逐渐向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人口流动使新疆北部人口民族结构再次发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苏侨回国，一些群众亦受此影响迁移到中亚。在哈尔墩社区调查时，老人们都提到部分俄罗斯、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族家庭迁至中亚，留下了一些“空房”。同期，“支边青年”进入新疆北部，在伊犁、塔城、阿勒泰至今仍有遗留下来的“青年农场”(已改制为村)。人口大规模迁入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自发迁移民及链式迁移人口，这些人口被集中安排到了牧区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兴修水利、开垦耕地、发展农业。在阿勒泰，他们的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山前一线的小盆地与大河流域，富蕴县吐尔洪盆地即是阿尔泰山东段山前一线最大的断裂盆地，水土资源条件较好，适合小麦、豌豆、荞麦等耐寒作物的生长。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组织一部分丧失生产资料的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于吐尔洪盆地务农。20世纪60年代初，迁入的汉族、回族农民组建了水利队、基建队与种子队，成为盆地农业开发的主要力量，使得这里很快成为阿勒泰地区有名的粮仓，也成为一个典型的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同期，红墩与哈尔墩也吸纳了较多的内地迁移人口。红墩社区到20世纪70年代新迁入人口已经超过了“户儿家”的人口。迁入哈尔墩的人口先是借用空房，后逐渐修建自己的院落，改变了该社区汉族与回族人口较少的格局，也促使各民族空间嵌入走向深入。

综上，红墩、哈尔墩与吐尔洪盆地构成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连续统和“农业区—城镇—牧业区”的空间连续统，反映了近代以来新疆北部各民族在空间上逐渐嵌入的历史进程。

三、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嵌入

空间嵌入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已为众多研究所揭示，族内聚集而族际隔离的居住空间可能造成以族群为边界的社会分割，进而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策源地。反观多族群混居社区，由于族际接触较多，改善和提升族际关系通常更为有利。[25]族际接触还存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在效果泛化现象，即从特定情境中泛化到其他情境、从个体泛化到所属群体、从接触群体泛化到其他群体。[26]这在调查的三个社区都有体现，由空间嵌入逐渐泛化至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其他方面，反映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

(一)文化嵌入：从跨文化交流到融合性文化生成

在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中，多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20世纪60年代前，哈萨克族在新疆北部地区总人口中的占比较大，聚居程度较高。因此，哈萨克语成为重要的族际交流语。红墩“户儿家”汉人不仅精通哈萨克语，还能熟练使用蒙古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从该群体中抽调了40多位青年充实到阿勒泰地区基层部门担任翻译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一项调查显示，塔城维吾尔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皆受哈萨克语的影响，比如元音音位、元音音变、元音和谐、辅音音位、音位组合都与哈萨克语相似，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动词采用的基本也是哈萨克语的形式或与其近似的形式。[27]维吾尔语中还在称呼、食物、器械等方面吸纳了俄语的词汇，比如lieba(面包)、maroxna(冰激凌)、biwor(卡瓦斯)、deroyi(酸梅汤)、varina(果酱)等等。塔城哈萨克语也从维吾尔语、俄语、汉语中借用了较多词汇，甚至还有少量塔塔尔语借词。[28]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汉族、回族、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多，加之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哈萨克语作为族际交流语的地位下降。即便如此，吐尔洪盆地的汉族和回族村民还是具备一定哈萨克语听说能力，日常对话不成问题。在三个社区调查时，对年龄在40岁及以下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访谈时无须借助翻译，而被访家庭中国家通用语言最好的往往是中小学生，说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取得了实效。

各民族语言上的变化是文化在地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中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发展。首先，各民族的生计都经历了改造，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技术与知识体系。在红墩和吐尔洪盆地，汉族入乡随俗，逐渐认同与熟悉牧业生产，他们意识到了在阿尔泰山草原发展牧业的重要性，家中普遍养殖牛羊，还涌现出了一些养殖大户。三个社区的哈萨克族牧民较早就掌握了农耕技术，改革开放后很快追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村民步伐外出务工经商。其次，各民族在物质文化层面既保留了自身文化特点，饮食中肉乳比例、居室装修(饰)风格、服饰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又出现了较多融合。汉族逐渐喜食牛羊肉，好喝奶茶；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食物中蔬菜和谷物比重增加；俄罗斯风味的糕点与各种甜食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喜好。哈尔墩的建筑还深受俄罗斯影响，房屋高大，墙体厚实，屋顶以人字形铁皮建成，外墙以绿色和蓝色为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红墩与吐尔洪盆地的房屋以我国北方夯土平房为主。当地各族人民都习惯出行骑马，拉运货物用马爬犁、牛爬犁等。最后，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各种文化活动。三个社区中，不乏精通阿肯弹唱、姑娘追、赛马的汉、回、维吾尔等各族居民，他们互相参加当地各民族人生礼仪(如葬礼、婚礼)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由于长期共同生活，人们对各自文化习俗中的禁忌有着清晰的认知，进退尺度拿捏得当，彼此在尊重文化习俗方面有着秘而不宣的默契。例如，“户儿家”汉人会参加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葬礼，只需在举行“乃孜尔”仪式时及时回避；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也参加汉族的葬礼，但在烧纸和撒“三仙土”的环节转身回避。

综上，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中发展出共享的融合性文化，包括语言互渗、生计混合、物质文化共享与文化活动的共同参与等。“融合”并不是“同化”，不是简单地由“多”到“一”的过程，而是通过相互学习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精髓而实现共同因素得到增长的过程，[29]也蕴含着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和包容多样性的思想。[30]总之，“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在三个社区都得到了鲜活体现。

(二)经济嵌入：从共生互补到有机整合

三个社区的形成时间、所处区位和民族构成各有不同，但在经济嵌入上大体都经历了共生互补到有机整合的发展过程。

红墩是阿尔泰山草原历史上形成且延续至今最古老的农业区，“户儿家”汉人农民生产的粮食、蔬菜和手工制品满足了哈萨克族与蒙古族牧民的需求。在该社区未形成时，牧民常需要到几百公里外天山北路的农区进行交换。“户儿家”汉人扎根克兰河谷后，很快认识到河谷地带之外区域“宜牧不宜农”，普遍饲养较多牲畜，夏季常交由牧民代牧。一些受访老人回忆，人口较多家庭多有二十来头牛、三五十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羊，人口较少家庭甚至“不事农作”，只放牧。与开垦耕地、修建水利、管理农田所需人力物力相比，牧业投入少而见效快。汉族农民非但未与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形成资源竞争，还弥补了游牧生计非自足性的不足，在经济上形成了共生互补的关系。民国时期，少量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迁入红墩务农，但因河谷地广人稀，与汉族间不构成竞争关系。哈尔墩社区位于塔城市东北角，清末便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人群的聚居地。通过各族老人的访谈，笔者获得了20世纪40年代初30户家庭男性户主的职业信息。23户维吾尔族家庭中，5人从事边贸，8人从事手工业，另有帮工、马夫、公职人员和宗教从业人员若干。边贸商人在塔城及周边地区收购牲畜、皮毛、羊肠、棉花等农牧产品，销售给俄商，再从俄商那里进口布匹、干茶、红茶、糖、棉线、烟、火柴等洋货销售。手工业主要是铁匠、鞋匠和木匠。据受访者讲，塔城维吾尔族中经营肉铺和饭店的为数不少。3户汉族家庭中，1人是公职人员，2人在社区经营杂货铺。据受访者讲，塔城汉族商人多售北京与天津的杂货、茶叶和蔬菜，开设药铺和饭店。3户哈萨克族家庭中，1人为铁匠、1人是理发师、1人是“包工头”。1户俄罗斯族家庭，受访者表示其父亲曾是苏联工厂中的工人，到塔城后从事器械维修工作。以上信息表明，民国时期塔城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经济体系，各民族占据着体系中的一个生态位，彼此间既有区分，又有着各种交换和互动，形成了共生互补关系。

20世纪50年代后，为解决“牧区生产艰难，牧民生活艰苦”的问题，政府组织哈萨克族牧民率先在吐尔洪盆地定居和发展农业，之后汉族和回族农民迁入，后者既补充了熟练的农业劳动力，也带来了水利、农耕与作物等方面先进的技术与知识。20世纪70年代，盆地形成了12个农业队，汉族和回族构成的队就达到了3个，他们还组建了1个基建队。由于生产靠畜力、生活上又离不开肉乳，每个队都有三五十头牛、一两百只羊的集体牲畜，便安排了三五户哈萨克族牧民放牧。就经济关系来看，汉族、回族农民与哈萨克族牧民之间出现了基于生计传统的分工合作，具有共生互补关系的性质。又由于社队这类总体性社会组织[⑪]的存在，生产和分配以社队为单位，所有人便被纳入了一个纵向整合严密的经济共同体中。红墩与哈尔墩也是如此。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社队内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以民族为区分，但又发挥了各民族生计所长，实现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有机整合。

改革开放初期，各民族间的经济关系亦呈现共生互补。在红墩和吐尔洪盆地，汉族、回族农民会承包哈萨克族牧民的耕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农业。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弃农还牧”，致力扩大畜群规模，尤其是在夏季会接收其他村民的零散牲畜代牧。一些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村民迁移到乡镇，转向服务业和商业，但他们进入的领域有所差别。汉族多经营百货商品、开照相馆、销售自行车和摩托车，回族则经营餐厅、收购皮毛，维吾尔族经营肉铺、餐厅和贩卖牲畜。哈尔墩位于塔城市郊，距离巴克图口岸较近，居民在职业选择上更为多样化：维吾尔族在口岸经商者较多，俄罗斯族与哈萨克族在口岸做翻译的多。汉族和回族的职业选择有两种：一是迁入邻近的哈尔墩村，获得了承包地和宅基地，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二是进入到城市的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经营百货店、开餐馆、承包小工程等。总之，各民族都尽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在产业、语言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优势。

市场体系中族群分工合作虽仍带有共生互补关系的特征，但又有了新的发展。耕地流转、牲畜代牧不再是农业人群与游牧人群之间的交换，而是个体家庭间的合作，彼此利益连接更加紧密。事实上，各民族在行业和职业选择上的群体偏好和区分很快被打破。20世纪90年代，吐尔洪盆地一些哈萨克族牧民跟随汉族、回族农民的步伐开始承包耕地种植黑加仑，或是进城务工，再或是进入牲畜、皮毛贸易领域。在哈尔墩调查时，笔者记录了51位居民当前的职业。15位维吾尔族居民有7种职业，23位汉族居民有5种职业，其他13位各族居民有4种职业。人们较为均匀地分布到了各行各业中，融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中，就业的族际差异不再明显，而是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有机整合的程度。

(三)社会嵌入：“像亲戚一样”的民族关系

由于长期杂居和共同生活，社区中生成了邻里、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关系，各族居民社会交往机会较多。我们对社区活动中心、小广场、店铺外空地、棋牌室、台球室、小夜市等公共场域做了持续观察，发现“既交往，又区分”是社会交往的逻辑。“交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往”指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成员，互动较多且交替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多语能力强的居民表现更活跃，还成为居民间的翻译。人们常用“一起玩”来描述彼此间的互动，用“像亲戚一样”来表达彼此关系的亲密。“玩”不仅指儿时在一条巷道追逐玩乐，还指成年后时常一起工作、一起做生意、一起聚会，彰显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各民族社会嵌入中的重要作用。“区分”是指人们因喜好活动不同，而表现出了一定的群体性。傍晚的小广场较为热闹，汉族、回族女性在中央跳广场舞——少数民族舞蹈尤其受欢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女性多在外围观看——更喜欢在家庭院子内举办舞会。棋牌室内，汉族、回族男性较多，好“玩牌”以消磨时间。棋牌室外或店铺外多置放有简易沙发或条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男性聚在一起拉扯家常、谈论时事、点评社区大小事务。在解释这些“区分”时，受访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居民说他们在这方面与其他民族“习惯”不一样，这主要指他们较多地保留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并投射到其社会交往中，具体表现为男性较多参与公共事务，而女性更多以家庭为中心开展活动。“既交往，又区分”的社会交往逻辑既表现了对各自文化传统的认同与传承，也表达了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四)心理嵌入：故乡认同与家园意识

调查的三个社区都是由近代以来不同民族迁移汇聚而成，但在调查时却丝毫没有移民社会的“陌生”感，反倒是有着强烈的“熟人社会”体验。人们对各个家庭的熟悉程度时常让我们惊讶。对一户进行访谈后，就很容易与三五户有亲缘关系、姻缘关系的家庭联系起来。受访者也会告诉我们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邻居叫什么名字、孩子叫什么名字，现在居住在何处，并很快帮我们联系。即便邻居已经搬出去一二十年，但参加这些家庭的婚礼、葬礼和过节时互访仍被视为义务。在解释这些行为时，他们会说这是“老习惯”。我们尝试着去界定“老习惯”的内涵，但最终不得不放弃。因为，“老习惯”并不与特定行为相对应，而是那些能够激起人们在语言、行为和情感表达上共鸣和默契之行为的集合。“老习惯”既指参加葬礼时进退尺度的拿捏，仪式(如婚礼)地点与餐食的选择，各民族节日互访中的礼节，也指经济活动(如土地流转、代牧)中的信任，还指对彼此文化传统(如农牧业知识体系、歌舞艺术等)的认知、熟识与尊重。

三个社区中每个家庭，甚至每个民族的生活及其变化都不一样，却共享了“迁移—扎根—发展”的生活历程。从大的历史时段来看，清末民国新疆北部及周边区域并不平静，迁移通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进入后都需要艰难地开辟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摆脱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在集体化时期共同致力于新生活的营造和社队共同体的建设，并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共同团结奋斗。改革开放后，各族群众都力图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发挥各自优势并找准自己的位置，借助农牧业的发展、商贸活动复兴和城市扩展的机遇实现繁荣发展。以此来看，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各族群众共享的历史记忆，并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所在地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有研究表明，迁移至新疆北部的汉族、维吾尔族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常持有“双重故乡”的观念，既视祖籍地为故乡，又视迁入地为故乡。然而，第三代与迁出地的关系就逐渐淡化，视新疆北部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32]21世纪以来，随着农牧民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新疆北部城镇的发展，农牧民普遍开始进城生活。他们较少出售村(社区)中“老宅”，常在夏季回“老宅”种菜、养家禽或度周末，保持着与乡村、与邻里的密切联系。总之，这些从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汇聚而来家庭，自然有民族之别，但却将红墩、哈尔墩或吐尔洪盆地视为了自己的“家园”——是心灵上的庇护感和归属感，是象征与体验的统一。[33]

综上所述，三个社区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嵌入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较深。

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

笔者认为，近代以来新疆北部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嵌入机制(后文简称“交融发展嵌入机制”)。以下对这套机制的内涵、生成条件、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

交融发展嵌入机制是对各民族“在交融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融”形态与过程的描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是各族群众生活历程与所在社区发展历程互构的自然结果。三个社区在形成之初都只是汉族、维吾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尔族或哈萨克族的移民点或定居点，随着其他民族的迁入和扎根，社区在空间、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并最终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凝聚出了家园意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由此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融合性文化的生成，促进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其次，各个方面的嵌入构成了一套整合有序的结构功能关系。空间嵌入为其他方面的嵌入创造了条件，而各民族在文化、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嵌入又推动了空间嵌入的巩固与发展。各民族经济上的互动自然不会仅限于技术的采借与物的交易，也必然包括人的流动与文化(知识、习俗、行为方式等)的交流，这有助于减少偏见、发展友好亲密关系、缩小心理距离。因此，每个方面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密不可分且相互支撑。再次，交融发展嵌入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展演和再生产。在调查的三个社区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众生活的常态，不断通过各族群众具身实践得到表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李静指出，这种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以集体潜意识的形态沉积于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34]本文的分析表明，交融发展嵌入机制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使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嵌入更加牢固和深入。

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即通过接触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提升群际关系，是有条件和存在限度的。奥尔波特(G.W.Allport)提出，促成积极接触的最优条件(optimal conditions)有四条，即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制度支持。[35]前文分析可知，调查三个社区都满足这四个条件。首先，尽管各民族在人口规模、迁入时间、生计或职业、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移民群体，未形成族群分层现象(族群间整体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不平等)。[36]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推动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迈进全面小康、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各族群众拥有共同目标。各民族既有因为战争、自然灾害、生存压力而被动迁移，也有为获得经商致富机会而主动迁移。各民族迁移的形式也有差异，有的是自发零散迁移，有的是有组织性迁移。迁移时代与社会情境也不同，从清末跨越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然而，人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在新疆北部实现了扎根发展。这就使得这些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民族共享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记忆。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指出，“通过它们(记忆)，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身长存”。[37]对社区而言，这些记忆亦在人们具身实践中得到展演、唤起与传续，凝聚出基于“家园意识”的共同心理结构。再次，各民族非但未处于竞争状态，反而有很多合作。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各民族基于生计与职业传统形成了稳定的共生互补关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向有机整合的转变。最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政策为族际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政策包括民族团结，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牧民生活，引导人口流动、促进社会结构嵌入，增进文化共同性、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等各个方面。大体来说，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北部各民族的互动满足群际接触“最优条件”，进而为交融发展式嵌入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前，新疆北部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正在发生一些显著变化，为深入发展交融发展式嵌入机制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加速背景下，新疆北部城乡人口流动加速，城乡人口民族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近代以来，新疆北部人口民族结构带有“城乡二元”属性，即城镇中汉、回、俄罗斯等族人口较多，乡村中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族人口较多。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新疆的数据为例，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乡村人口占比分别高达80.79%和84.93%，汉族与俄罗斯族城镇人口占比分别为53.62%和83.50%。[38]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生活在乡村的汉、回、维吾尔等族的农业人口开始向城镇流动。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族的牧业人口也开始进入城镇就业、务工和生活，各民族将在城镇这个新场域中构建和发展相互嵌入的新格局。[39]同时，由于汉、回、俄罗斯等族人口城镇化进程显著快于其他民族，使得牧区乡村业已形成的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表现出了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缩的态势。在调查的三个社区中，一些汉、回、俄罗斯等民族的家庭迁入城镇后，将原有的乡村院落、住房转售给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家庭。这些新变化意味着在城乡人口流动大背景下，新疆北部一些地区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有可能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如何维系、巩固和发展城乡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格局将成为促进各民族空间嵌入的新命题。

二是各民族经济与社会嵌入程度持续深化，但文化嵌入相对滞后。经笔者对新疆北部牧区多地的调查，发现乡村农牧民家庭生计结构已经呈现出了“半耕(牧)半工(商)”的特征。[40]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职业技能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的力度，为农牧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这意味着，不仅进城农牧民，乡村中的农牧民也广泛参与到了工业、商业与服务业中，与其他人群交往交流的机会显著增加，使各民族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嵌入程度持续深化。对进城牧民的调查发现，相较于生计方式与职业的快速转变，他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相对滞后，成为影响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向现代化迈进的制约因素。[41]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在文化层面增进共同性，对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十分重要。

三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但尚未被充分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前文已叙，三个社区中各民族共享“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历。这些经历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民族团结记忆，并通过地方志文献、口述历史、家谱、展馆、影视作品等方式不断展演和强化。[42]新疆北部各民族共享“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历和民族团结记忆具有普遍性，为各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文化资本，然而，学术界尚未形成全面和系统的认识，政府还未对其进行有效的发掘和转化。因此，如何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提炼出各民族共享的民族团结记忆，深化各民族心理嵌入，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五、结语

本文基于新疆北部三个典型社区的考察表明，对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嵌入的分析需要置入于特定的时空坐标和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才可能总结和提炼出区域性的嵌入机制；同时，这类机制恰恰由于扎根于区域历史与社会现实之中，才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才能在时代与社会进步中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区域性嵌入机制又具有对于区域的超越性，若将新疆北部与其他区域(北仑、迪庆、呼伦贝尔等)的研究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共性，即各民族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嵌入加强了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各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始终在保持张力的同时被共同性超越”。[43]这应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特征，为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伟大转变和发展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由此可见，区域性嵌入机制的研究具有丰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认知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44]区域性各民族嵌入机制的研究应是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新华社：《习近平于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国民族》2020年第9期。

②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民族》2021年第8期。

③徐平：《在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北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李志龙、高云松：《云南迪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李永祥、曹津永：《从当代云南“山坝结构”民族分布的新变化看民族互嵌交融——基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三个案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赵月梅：《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呼伦贝尔地区的实践与启示》，《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④国家民委调研组：《金山银水春常在，大爱之地花常开——新疆阿勒泰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和谐的调查与思考》，《求是》2016年第1期；新华社：《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新疆塔城地区民族团结之花长盛不衰》，国新网，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5/33525/xgxwfbh33531/Document/1450031/1450031.htm。

⑤2011-2014年，笔者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吐尔洪盆地共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做了11个月的田野调查。2018年、2019年，笔者两次返回该盆地对近期的一些变化进行了调查。2015-2017年，笔者带领7人调查组在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红墩镇完成了2个月的田野调查，2018-2021年笔者又多次到红墩镇做补充调查。2021-2022年，笔者带领10人调查组在塔城地区塔城市哈尔墩社区分两次，完成了70天的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三个社区的田野调查。

⑥齐清顺：《清朝"平准"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及其影响》，《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⑦⑧吴轶群：《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特征探析》，《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⑨(清)永保修：《塔尔巴哈台事宜》，张艳整理，选自郭院林主编：《清代新疆政务丛书·第三册(北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⑩吐娜：《近现代新疆蒙古族社会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⑫"户儿家"一词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户儿家"是对农村、农民的指代，是对清代"户屯"农民的称呼，以区别于军屯和犯屯；另一种观点认为，"户儿家"是游牧民对定居务农居民的称呼。以笔者在红墩调查情况来看，当地人关于"户儿家"的解释为第二种。

⑬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⑭周东郊：《新疆阿山区概况》，《新疆论业》1940年创刊号。

⑮张莉：《天山北麓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175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页。

⑯(清)王樹枏等纂修：《新疆图志(二)》，朱玉麒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页。

⑰马登瀛、贾树模：《新疆行程记(续经十二号)》，《地理学杂志》1911年第2期。

⑱国际性与区域性重大事件包括外蒙古独立、俄国十月革命、苏联激进集体化、马仲英两次入疆、东北义勇军归国与三区革命等。

⑲周东郊：《新疆的塔城》，《西北经济》1948年第2卷第1期。

⑳周东郊：《新疆阿山区概况》，《新疆论业》1940年创刊号。

㉑陈澄之：《塔城区与阿山区》，《旅行杂志》1947年第9期。

㉒吴蔼宸：《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㉓谢晓钟：《新疆游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

㉔谢晓钟：《新疆游记》，第324页。

㉕郝亚明：《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㉖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㉗邓浩：《试论塔城维吾尔语》，《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㉘黄忠祥：《塔城地区哈萨克语探析》，《语言与翻译》1996年第2期。

㉙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与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

㉚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㉛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㉜罗意：《牧区汉族的在地化——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山草原的多点民族志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罗意：《牧区散居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适应——阿尔泰山草原红墩社区的个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㉝陈浩：《人类学家园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㉞李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构的心理学分析》，《民族研究》2021年第5期。

㉟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㊱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㊲[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㊳田雪原主编：《中国民族人口(四)》，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7、370页。

㊴罗意、王玮、张文聪：《新城新生：新疆北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牧民生活转型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7页。

㊵罗意：《游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基于新疆吐尔洪盆地的考察》，《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㊶罗意、王玮、张文聪：《新城新生：新疆北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牧民生活转型研究》，第213页。

㊷罗意、王佩：《生成与重塑：阿勒泰市红墩"老户儿家"汉人族群关系记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罗意、艾丽菲热·莫明：《空间嵌入视角下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形成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1期。

㊸李志农、高云松：《云南迪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㊹新华社：《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83.htm?ivk_sa=1024320u。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